

附录 2 段落练习二参考答案

第一章

我对这些不公平现象大发议论时,我在汽车工业界的同仁们却都不做声,因而留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我是反日派。这一阵子,国内甚至还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讲的是三年级历史课老师正在进行一次小测验。

“听好了,同学们,”老师说,“是谁说过‘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只能为祖国奉献一次生命’?”

坐在第一排的一个日本小姑娘站起来答道:“是内森·黑尔在 1776 年说的。”

“很好,”老师说。“那么,是谁说的‘不自由,毋宁死’?”

那个日本小姑娘又站起来说:“是帕特里克·亨利在 1775 年说的。”

“答得好!”老师说。“同学们,这位木子同学答对了这两个问题,我觉得真不简单。不过,其他同学应该感到脸红。别忘了,你们是美国人,而她是日本人。”

就在这个时候,坐在教室后排的一个男孩低声骂道:“去他妈的日本人!”

“好哇!”老师厉声问道,“这是谁说的?”

话音刚落,就有人大声应道:“是李·亚柯卡在 1982 年说的!”

这个故事很逗,但实际上我对日本人是十分佩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起点,他们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目标。最重要的是,为了达到目标,他们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战略。

第二章

我们现在的目标应该是共同努力,使中国能够按时完全兑现其承诺,同时使中国能够运用世贸组织的规则,防止其他国家不公平地拒绝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

我要强调的是这关键的一句——我们应当共同努力。中国兑现其承诺并不总是件易事。光靠法令和行政命令,尽管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许多事情需要大量的决策、调整和专业知识才能改变。问题一旦出现——这是很自然的——我喜欢使用的方法是商榷,尽量了解中国方面的观点,并且就如何使中国保证兑现其承诺提出建议。

美中两国还应当就去年 11 月多哈会议上提出的开展全球贸易谈判问题进行合作——就在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中国被接纳加入世贸组织。世贸组织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肯尼迪、东京和乌拉圭回合里提出的降低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倡议,在过去 4 年中巩固和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采取大胆的步骤,开放农产品、制成品和服务市场,这将在未来几年里带来同样的好处。

中国有许多可以向世界展示的宝贵经验,如开放经济、为外资提供优惠条件、降低关税、进一步遵守市场规则。因此,我希望中国积极参加全球谈判,劝说拒绝改革的国家走上这条可行的经济发展之路。

第三章

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伦·斯科尔斯给毕业班做的演讲

祝贺各位毕业生。你们离开大学之际,正逢金融界和中国的创新时代。这是金融界的美好时代,因为金融基础设施即将发生快速变化。金融现代化和金融创新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的财富增长与发展。

你们很幸运,因为你们所学的课程为你们打下了金融理论和金融工程方面的坚实基础。金融理论很重要,要牢记在心,运用它,发展它并且随着经历的丰富去修订它。你们有很好的机会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人一向认为,光靠理论或者实践是不够的。两者对于持久的金融创新都十分必要。

我很自豪地看到贵校处于技术创新的中心。我很兴奋,因为金融技术中心将助力未来的研究和建模,使技术与金融相得益彰。这些努力将更快地缩小两者的距离,而通过两者的结合,新方法将取得迅速的进步。有太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研究、建模,在现有实践的基础上提高我们的理解,构建面向未来的新架构。

习主席曾经表示,金融与金融的中介功能将在今后几年对中国进入小康社会发挥重要作用。人民币国际化也将是推动财富增长的必要步骤。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崭新领域。

再次祝贺你们第二届毕业班。你们很幸运,得到了思维上的训练,你们的技能将广受欢迎。要有耐心和恒心。要通过试验来学习,虽然有时候会遭遇失败,但这样有助于你们改进模型和方法。要不断地向新同事学习。这是关键。祝大家好运。

第四章

“投资”这个词有两层意思。在收入确定理论即就业理论中,经济学家使用这个词来表示全社会实际资本总量的增加。这种增加可以表现为库存的增加,比如库存量的增加,新添一台机床、一家工厂或一幢房子。这里强调的是,把全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实际资本总量的增加。一个社会中的成员把他的房子卖给另一位成员,不会增加这个群体所拥有的房子总量,因而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不属于投资。此人在这所房子上的投资已被另一个人的负投资所抵消。然而,对个人来讲,对现有房子、土地或股票所做的投资,其含义与在宏观经济学中所说的含义不同。也许,这是“投资”这个词通常的、非专业的用法,意思仅仅是获得一宗资产。词义出现差别的原因在于参照群体的大小不同。无论从哪种意义上看,投资都意味着从某一群体以外获得资产。从宏观经济学的意义上说,投资的含义虽然相同,但由于参照群体范围很大,只有创造出一宗新资产时,才算得上是投资。在国际贸易上使用“投资”这个词,其含义也是一样,因为参照群体是国家。然而,国家仅仅是世界上的一个子群体。因此,如果某国一位居民在外国购买了一块土地或者任何其

他现有资产,国际投资便发生了。如果某国的一位居民获得一宗资产,无论是外国人的一笔债务(即金融资产),还是在国外的有形资产(即实物资产),都叫作国际投资,不过,按照宏观经济学家对这个词的解释,如果一位居民从本国另一位居民手中买进一份外国资产,就不算该国在国外的投资。比如,克莱斯勒公司从福特汽车公司手里买下法国辛姆卡汽车公司,就不能算作美国在国外的投资。

第五章

恼怒的起因之一是以前的改革计划没有成功。人们为先前的努力泡汤感到沮丧不已,甚至到了一听到你指出一个重要的新问题就会发疯的地步。另一个原因是眼下的困难,而人们很少会去想这些困难是自己造成的。

导致虚假自满的焦虑跟恼怒大不相同,但其最终效果却可能十分相似。情绪焦躁的人到头来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工作、事业和所在团队的未来。他们满脑子想的是找出离自己最近的危险。他们会花很多时间寻找退路。忧心忡忡、四处寻找避风港的人决不会做出具有真正紧迫感的行为。

产生担忧和焦虑的原因很多,但是它们与恼怒一样,也是因为心头蒙上了以往改革失败的阴影。如果人们被要求为公共利益做出牺牲,结果牺牲做了,生活却不见好转,他们若是因此感到伤心,便有可能变得非常焦虑。经验告诉他们,应付新建议的最好方法是保护自己。于是,他们对掌权者言听计从——即便完全是在浪费时间,要不然就逃之夭夭。

和自满的人一样,带着虚假紧迫感去行动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人类向他人——甚至自己——掩盖内心恐惧和恼怒情绪的能力,有时会大得惊人。

第六章

乌拉圭回合农产品贸易谈判的各项目标雄心勃勃,给人印象至深:“建立一个公平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产品贸易体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消除农产品贸易中的不正常做法。”许多研究报告都把乌拉圭回合协议说成是包括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内容。

在此协议签订之前,农产品贸易不受大多数多边贸易规则的制约。许多国家都对农产品贸易设立了一大堆复杂的、变化不定的高度保护性非关税壁垒。多年以来,世界各国受非关税壁垒制约的农产品贸易量实际上都在增加。农产品出口大国越来越多地使用出口补贴作为一项主要保护措施,农产品的平均保护水平从1979—1981年间的41%提高到了1992年的74%,大约是制成品关税的15倍。

新规则与关贸总协定以往对待农产品贸易的做法有着根本的区别。新协定规定,所有的非关税壁垒必须按照商定的最高税率转变为关税(这一过程称作关税化)。该协定还要求,在以后六年(发展中国家为十年)内将关税等价物和普通关税平均降低36%(发展中国家为24%),每个税目至少降低15%(发展中国家为10%)。

毫无疑问,关税化代表了农产品贸易规则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将使农产品贸易朝着与关贸总协定中对制成品贸易采取的做法相同的方向靠拢,并且使进口保护具有透明度。关税一般比其他进口壁垒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关税更容易预测,歧视性更少,更便于降低,并且更不易于造成腐败现象;关税还有助于国内市场竞争,使农产品进口国能够根据世界

市场上的变化来调整其贸易。

尽管乌拉圭回合似乎通过关税化提高了进口保护的透明度,但是在大多数国家里,这并没有使贸易自由化程度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大多数发达国家规定了新的基础税率,但新税率的保护性质甚至高于它们所取代的非关税壁垒。这些新的基础税率削减 36% 之后,到 2000 年,许多产品的税率仍将居高不下——不少产品的税率将同该协议签订前的实际税率一样高,甚至会更高。

第七章

创新才是出路

消费者和生产商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获胜的一方是消费者。在过去几十年里,世界经济秩序一直是以过量需求为主导;胜败取决于是否掌握包括资本在内的稀缺资源。但是,自 21 世纪伊始,消费者开始发现,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里,太多的产品和服务在外观、感觉和性能上如出一辙。一度抢手的商品现在比比皆是、唾手可得,这就使决策权牢牢地掌握在了消费者的手里。

这一变化对消费者有利,却使生产商乱了阵脚。商品化——在我看来是 21 世纪的癌症——助长了激烈的价格战,导致价格、毛利率和企业利润节节下滑。由于价格成了唯一的差别所在,生产商们只能去面对这一挑战:他们必须设法做到鹤立鸡群。

除非你能向消费者提供不同凡响的东西,否则每次取胜的总是低成本的生产商。面对着印度和中国的崛起、甚至是重整旗鼓的欧洲,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在今后几十年里,美国将如何与这些强大的新生力量展开竞争,到那时,它们很可能比我们更有实力,能够以低出许多的价格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

我们只有一种办法来避开这片商品的沼泽地,但做起来谈何容易,那就是靠创新。

第八章

最后一点,如果合资企业如你所预期的那样获得了利润,那么,无论是从所在国还是从美国的角度制定合理的节税计划,都将有助于你“保住钱财”。当然,在最初的阶段里,征税环境肯定会在是否把合资企业办下去的问题上影响你的决策。不用说,要是不能获得相应的利润,你很可能不会去办合资企业。然而,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如果你能够调整你的收益流转以避免出现过多的、而在美国又无法享受的税收抵免,你就应当事先把节税计划纳入合资企业的总体框架中。具体来说,如果在德国纳税对你有利,因为你可以通过国外税收抵免获得特许权收益,那么,你就会愿意最大限度地提高这一收益流转。但是,在巴西股利收入若是超过一定水平(例如,三年期间占注册资金的 36%),就要缴纳巨额税款。因此,在制定分红方案时,如果合伙人提出的红利超出这个限度,你当然不会同意。

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合资企业是未来发展的潮流。但是,要想成功地顺应这一潮流,必须吸取以往合资企业的综合经验,并据此制定方针,以尽量减少所在国和美国在征税方面的双重影响。合资企业在所在国的确可以有利可图,但是,它实际成功与否,取决

于你在美国的账本上的未行数字。

第九章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高度互联的时代,而我们现有的体系、结构和正式制度已不再适用。各种紧迫的全球性问题可能瞬间出现,而且毫无征兆。在此同时,推动全球发展的新的未曾预见的机遇和积极变化也不断涌现,我们必须利用它们为人类的未来服务。

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之间的界限已经打破。我们这个互联社会的新的现实是,全球、区域和行业的发展彼此密切相关。技术革命正在改变着决策的大背景,破坏我们的传统决策程序。

今天,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世界需要全球层面的合作,而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原因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相互依赖。

本论坛自1971年成立以来的经验表明,在一个高水平、非正式和互信的环境里,来自各行各业——企业、政府和民间团体——的相关各方汇聚一堂,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在各类国际机构中,唯有本论坛是一个不偏不倚的平台,致力于把对话转化为洞察力,把洞察力转化为议程,再把议程转化为行动。这为我们实现使命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深受全球社会相关各方信赖的合作伙伴,在它们着手变革以回应遍及世界、意义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时候,我们会和它们一起来改善世界的现状。

第十章

迪斯尼甩掉网飞意味着什么

这场一触即发的战斗很适合改编成漫威系列漫画里的故事。8月7日,网飞宣布了它成立以来第一个并购计划,要把苏格兰漫画出版公司米拉世界收入囊中,但未透露收购价。第二天,漫威的东家迪斯尼亮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公司首席执行官鲍勃·艾格告诉投资人,到2019年,他将把《米奇妙妙屋》的全部内容从这家顶尖流媒体平台上撤下来。他的宏伟蓝图是什么?要建立迪斯尼自有品牌的流媒体平台——绕过网飞。消息一出,两家公司的股价应声下挫,原因是无所适从的投资人担心,这两家公司谁少了对方都会日子难过。不过,这次分手正中网飞下怀——它想开发并拥有更多由自己销售的内容,以防今后被人遗弃。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随后的一个星期,网飞从迪斯尼挖走了电视连续剧《丑闻》的编剧珊达·瑞姆斯。这些举措虽然会对迪斯尼和网飞都有利,却未必对消费者有利,因为消费者最终可能要为新添的平台多掏腰包。好消息是什么?我们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流媒体选项。那么坏消息呢?也是我们很快会有更多的流媒体可选择了。

第十一章

那么,这会把翻译行业置于何种境地呢?从迄今尝试过的众多人工智能方案来看,机器翻译的质量依然粗劣不堪,对于著名品牌而言尤其如此,因为这些品牌(理应)对其内容和风格要求极高。但是,鉴于人们为改进机器翻译正在做巨大努力,机器很有可能重新定义人类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可能看不到人类译员,但会看到人类在翻译过程中的身影。机器将完成翻译中的累活,由人类来负责内容的编辑。在独立操作的人工智能远未出现之前,这种形式的增强型智能很可能成为主流。

尽管如此,让机器人完全取代人类译员仍然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译员向我们提出的最常见的问题都与文化有关联,显然,了解源语文化与理解源语文本同等重要。不知还要多久才能训练人工智能去理解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以避免出现令人尴尬的错误。同样,让机器结合背景去分析难以辨析的词义,也是挺有意思的。例如,捷克语里有一个单词 *prozvonit*,意思是“在打电话时只让铃响一声,然后等对方打过来”;还有一个印尼语单词 *jayus*,意思是“讲得烂得令人发笑的笑话”。

抛开所有那些大胆的预测,我确实从中看到人工智能对翻译行业如今产生着重大影响,主要在处理工作流程和自动化方面。

翻译记忆库已能够提高人工翻译的速度,为译员提供现成的词汇和短语的译文。显然,人工智能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提供支持,自动完成很少有人愿意做的重复而且耗时的工作。

然而,人工智能尚不具备创造力、理解力和个性,而正是这些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翻译、本地化或创译。语境问题或者某个单词的意思发生演变,这些也是总会遇到的难题。在语言这样一个情感化和个性化的领域,人工智能的缺点就在于它不是人。因此,虽然我们看到机器翻译开始承担翻译工作中更为基础性的任务,但想要完全取代熟练的人类译员仍需时日。

第十二章

胡锦涛并不是第一位必须就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对美国提出的贸易交涉做出决策的中国领导人。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位。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快速增长的工业生产和出口,使它如同 1960 年代的西欧国家和 1980 年代的日本那样,成为最受美国贸易政治重视的国家。美国正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反映出它对中国向市场经济的令人印象深刻但仍不完善的过渡感到焦虑,认为中国的市场还没有做到像美国那样开放。这种观点由于华盛顿认定美中进出口贸易高度不平衡而变本加厉。美国的出口额在继续快速增长;2005 年的对华出口总额为 418 亿美元,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但是,引起人们关注的却是 2 435 亿美元的对华进口:它相当于美国对华出口的六倍,使双边贸易赤字达到了惊人的 2 000 多亿美元,打破了美国与任何单个国家的贸易赤字记录。

美中贸易的巨大利益反映了这两个位于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但也揭示了两国贸易问题的根源,从而突出了双方加深相互了解的必要性。我希望,《美国贸易政治》中文版的发行能够多少有助于中国了解美国的贸易政策和制度。本书描述了灵活机动、随机应变的美国贸易政策制定体制,该体制使美国经济得以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利益,先是限制、然后是降低和取消了美国大多数贸易壁垒。但是,它也是一个开放的、吵吵嚷嚷的体制,经常批评国内和国外的贸易惯例以及可能限制进口之行为所产生的威胁。若要使美国市场继续开放下去,需要得到主要贸易伙伴的合作——比如在相互降低贸易壁垒、根据经济状况的变化调整汇率等方面。1985 年,欧洲人和日本人决定使其货币升

值,这对扭转美国强劲的贸易保护势头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若能采取同样的行动,对实现2005年以及之后的贸易—政治平稳局面也许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十三章

企业顶层人事变动

大楼角落里的首席执行官办公室已经变得有点更加白人化,也有点更加男性化了。

在百事公司担任了12年首席执行官的英德拉·努伊(中文名卢英德),将在本月告别她为之效力24年的东家。

在大牌食品与消费性包装商品业里发生的一连串离职事件中,努伊是最近的一例。在过去一年里,艾琳·罗森菲尔德从亿滋公司离职,德尼斯·莫里森(中文名莫睿思)离开了金宝汤公司。这二人加上努伊的接替者都是男性,从而使《财富》500强企业的掌门人只剩下24名女性了。

随着肯尼思·切诺尔特(中文名钱纳特)告别美国运通,马文·埃利森去职杰西潘尼百货,《财富》500强中的黑人首席执行官如今也只剩下两位——美国退休教师基金的罗杰·弗格森和默克制药的肯·弗雷泽——为2002年本杂志开始跟踪该数据以来的最低数字。

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截至今年8月,《财富》500强企业中总共有91位首席执行官离职。

在全美大大小小的公司当中,卸任的首席执行官数量比去年增加了8%。据就业咨询公司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统计,在2018年,已有725名首席执行官交出了进入公司的门卡,为2014年以来的最高数字。

虽然反性侵运动方兴未艾,却只有10名老总是因丑闻而离职的。

第十四章

“健康是与我共事的高管们最关心的事,”拉迪卡·帕潘德里欧说,她是一名高级客户合伙人,专长领域是旅游、接待与休闲。她指出,与她合作的公司通常都在物业管理层级——比如酒店——设立卫生与安全主管,而非专门有一位高管从战略上着眼。因此,大公司对新冠病毒肺炎所做的回应都是“极其没有条理的”。

“一切都毫无章法,”帕潘德里欧说。她指出,有的企业依靠人力资源官员,或者在全公司成立领导小组来应对疫情;有的则与卫生机构(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合作。“没有一个人在负责推动整个进程。”

她和她的同事很早就投身于这次疫情,他们开始组织攻关小组来制定企业首席卫生与安全官的雏形,其职责是负责减轻疾病蔓延的风险,以及在全公司普及卫生与安全知识。

这样的职位在企业发展史上绝非没有先例,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克里斯蒂·福特·查平说。大约在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增速和进步时代的开始,美国各企业成立了“工业医学”部,旨在防止事故发生和传染病蔓延。这一时期恰

逢人们对微生物学理论的认识普及,查平解释道。企业一方面希望员工身体健康以有利经营,一方面也希望以此应付工会力量、负面新闻和监管诉求,查平说。他疑心当下的企业也出于同样的动机制定更有力的措施,以避免公关危机和官司缠身。

鉴于企业都在考虑下一步如何做,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威廉姆斯期待企业开始更加宏观地考虑种族主义和结构性不平等之类的问题。“我认为,首席公共卫生官可以提供评估哪些是卫生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手段,”她说。“这些决定因素有助于建模和加深对健康与社会正义的理解,从而可以引导经营实践,比如工资的确定等。”

当然,首席卫生官还能帮助公司就复工复产问题做出更加科学的决策。泰森食品公司最近设立了一个首席医务官的职位,负责管理新冠肺炎风险。AMC公司首席执行官阿伦则在疫情爆发之初便求助于威廉姆斯。威廉姆斯把他介绍给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乔·艾伦,后者是《卫生的建筑物:室内空间如何提高业绩和生产力》一书的作者之一。艾伦与他现在及过去的同事和研究生们一起,一直在向AMC公司提供相关建议,如空气过滤、静电喷雾器和清消协议等问题。

“让人们重回影院的唯一办法是,使大家信赖经营者能够安全、清洁地管好他们的影院,”阿伦说。“我们必须找到世界上最棒的专家为我们出谋划策。”

第十五章

埃及位于三大洲交界处。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成为连接欧洲同印度及远东的主要海运通道,商业也逐渐繁荣起来。英法等国的行为准则成为埃及上流社会的行为指导模式,其商业文化也以欧洲体制为规范。但是,广大民众仍然恪守本土生活方式,历史悠久的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教传统也在继续发扬光大。因此在20世纪初期,埃及——特别是开罗——成了世界各大文明融汇的地方。

1956年苏伊士战争结束后,埃及的文化双重性受到了新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冲击。纳赛尔总统领导的政府对许多私有资产和外国资产实行了国有化,国家控制了埃及的主要商业活动。1970年代,政府发起经济自由化运动,外国公司卷土重来,旅游业再度兴旺。1980—1990年期间,埃及政府和工商界进一步加强了与国际商界的关系。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人们把埃及经济和商业文化看作一种混合模式:政府和商界在思想意识上倾向于西方,但公共部门仍在商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国有和私营两大部门的经营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公共部门里官僚作风盛行,私营公司的情况尽管好一些,但由于大型私有企业的领导人多为原政府官员或军官,官僚作风仍随处可见。

有人把这种混合型模式解释为代沟问题。具有高度创业精神的年轻人在经商方式上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公共部门里工作的老一代人仍在商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尽管政府大力推行包括私有化在内的全面经济改革,这种混合模式仍将存在下去。

第十六章

在如今这个彼此紧密联系的世界上,文化对社会的塑造能力显而易见。从宝贵的历史遗迹和博物馆,到形形色色的传统习俗和现代艺术形式,文化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以

无数形式将我们的日常生活装点得缤纷多彩。文化传承构成了身份认同与社区凝聚力的一个来源,尽管人类社会同时会受到种种令人困惑的变化与经济动荡的冲击。创意有助于构建兼容并蓄、丰富多元的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意一道,为充满活力、不断创新、繁荣昌盛的知识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文化决定了我们是谁,并赋予我们身份。没有文化支撑的发展是不能持久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衡量可持续发展目标来确定文化的作用,包括重视优质教育、可持续城市、环境、经济发展、可持续的消费与生产模式、和平包容的社会、性别平等、食品安全等项目。教科文组织深信,缺少强大的文化要素,任何发展都会变得难以为继。

教科文组织采取了以下三种措施:带头在全球提倡文化与发展;与国际社会合作,制定明确政策,建立法律框架;脚踏实地,支持政府与当地利益相关方守护文化传承、巩固创意产业、提倡多元文化。

今天,创意已然成为一种有助于改变我们看待城市方式的、最有希望的途径。无论是重振地方经济,重新思考交通或住房政策,重新开发城市空间,还是为年轻人开拓全新视野,创意都是城市政策与举措的强大推进动力。全球各地的城市都在关注文化与创意产业,并将其作为开启未来的灵感。各地选出的代表与城市决策者也纷纷支持这个愿景,从战略上将创意视为解决经济、社会、环境等现代城市问题的创新途径。更重要的是,这是专业人士与普通市民的共同愿景,他们从自己所在的社区和街道做起,共同建设更可持续、更人性化的城市。

创新城市管理的愿景正在推动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的发展。自2004年创办以来,创意城市网络已经成为促进和推动这个可持续发展城市新路线的战略平台。教科文组织通过制定标准和实际行动为以下活动铺平了道路:展示创意对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作用,协助国家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在国际范围内推广这一愿景。文化与创意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多元发展,创造工作岗位,还能通过参与建设城市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多样性来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

